

进入增长新常态下的浙江经济

—浙江经济增长、结构转型和升级趋势观察

杨祖增 来佳飞 冯洁

摘要：浙江经济已率先步入“新常态”，进入减速换挡、结构调整与动力重塑的新阶段，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现象、新特征。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剖析了近年来特别是 2014 年以来浙江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新变化与新特点、新趋势与新挑战，认为浙江经济增速换挡态势已基本确立，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动力结构、城乡区域结构、治理结构等显现出加速调整升级迹象。但调整还远未结束，浙江经济仍然面对着新旧增长动力转换、产业转型升级、企业竞争优势再造、政府管理应对等方面更为严峻的挑战，需要加快形成更加高效的新制度供给、更加强劲的创新驱动增长新模式。

关键词：新常态 经济增长 动力转换 结构转型 浙江

作者杨祖增，《浙江经济》杂志社副总编辑、高级经济师；来佳飞，《浙江经济》编辑、经济师；冯洁，《浙江经济》编辑、经济师。（杭州 310006）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总是离不开一定的速度和合理的结构。在历经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进入“十二五”的浙江经济增速显著放缓，率先步入以“新常态”为标志的转换阶段，呈现出许多不同以往的新现象、新特征。“新常态”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虽然从表象上看是经济增长减速和换挡，但本质上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增长动力重塑的过程，是一个经济体迈向更高阶段的重要体现。如今浙江经济升级换挡、加力爬坡的进程正在展开，近期经济运行中已经或正在出现的深刻调整和转折性变化，将会对浙江经济中长期增长产生较大影响。为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新常态下浙江经济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本质特征和趋势，本文试图以实证的视角剖析近年来特别是 2014 年以来浙江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新变化与新特点、新趋势与新挑战。

一、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和内在要求

“新常态”以全球危机为界，是近年国际社会描述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个常用说法，在宏观经济层面：西方媒体将之形容为“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然而，同样一个“新常态”，在不同的经济体、不同的时期所表达的现象和根源具有不一致性。如果说全球经济新常态是对未来世界经济趋势的一种悲观认识，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则包含着经济朝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积极内容。国内对于新常态的高度关注是从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中国经济要适应“新常态”这一重要判断开始的，2014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释。中央提出的“新常态”概念是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述。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所代表的经济发展状态，在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都曾先后出现。尽管各国或地区进入“新常态”的原因会有所不同，但纵观历史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进入所谓的“新常态”，往往呈现如下一般特征：

（一）增速换挡

对各国和地区经济增长数据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后往往经历一个从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中速增长到低速增长等若干个阶梯式下降的增长过程。以日本和韩国为例，日本 1969 年经济增速出现拐点性变化，平均增速从之前 10 年的 10.4% 下降至后 10 年的 6.3%，下降 4.1 个百分点；韩国 1988 年经济增速出现拐点，平均增速从拐点前 10 年的 10% 放缓至后 10 年的 7.6%，下降 2.4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告别两位数增长，进入 7%—8% 的中高增长阶段，被认为是中国新常态经济的首要表现。

（二）结构调整

高速增长期的典型结构，是工业拉动增长，比重相应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进步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重心开始由工业（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需求结构中消费所占的比例逐渐提高，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消费需求和服务业驱动。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普遍发生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减速，就是工业化向城镇化、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转换过程中的一种趋势性特征。新常态下结构问题将在不断凸显中得到重构的过程，结构变迁将发生一系列趋势性变化。

（三）动力转换

增速回落、结构变动的背后则是需求和供给条件显著变动和重新组合而引发的增长动力机制的改变。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攀升和经济发展迈向更高阶段，传统市场空间饱和，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要素边际报酬递减”，单纯依靠要素禀赋和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将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即动力机制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调整为技术驱动和创新驱动。

（四）风险凸显

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落后产能累积的结构矛盾、金融杠杆形成的债务风险、流动性泛滥造成的价格泡沫、粗放发展加剧的生态和资源危机等都将逐步显现，而新常态下主动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则会使经济进入风险集中释放期，进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新的挑战。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内在要求是“质量上台阶”。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减速、动力机制调整、矛盾风险凸显的总体格局下，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将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诉求，经济发展方式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将在内生动力和外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生“深刻的趋势性变化”，经济增长会更趋平稳、增长动力会更为多元，这是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过程。正确认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和内在要求，有助于我们对浙江经济发展做出更准确的研判。

二、增速换挡：中高增长区间在企稳态势中逐渐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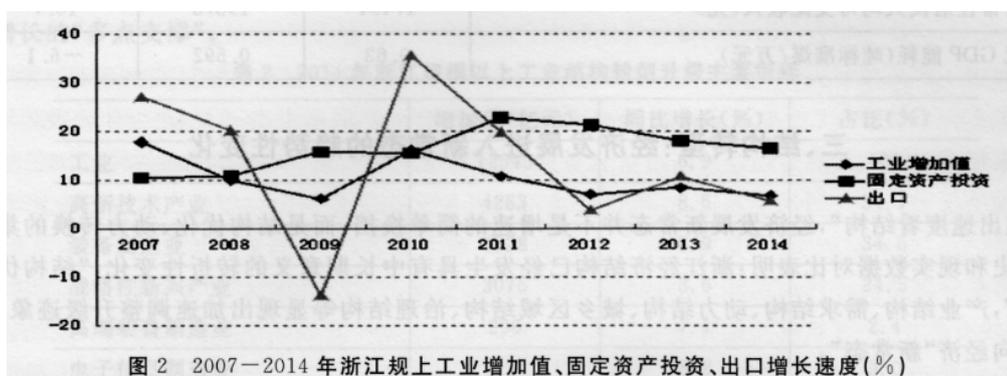
2014 年，中国经济发展正式确认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特征更加明显。这一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首次历史性地突破 4 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7.6%，走出了一条“与全国和部分东部省市下半年增速明显回落的趋势不同”的轨迹。在中国经济进入整体减速的大背景下，2014 年浙江经济展现出优于全国同期运行的态势。从主要经济指标看，浙江经济率先呈现企稳态势，但绝不意味着将来会“V”型反弹，实际上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讨去几年，浙江经济最为突出的状态是转向中高速的换挡之势。从改革开放启动到 2010 年，浙江经济保持了 32 年的持续高速增长（1979—2010 年浙江 GDP 年均增长 13.0%，高出全国平均 3.1 个百分点），但进入“十二五”后浙江经济增速放缓至个位数，2011 年、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增速分别为 9.0%、8.0%、8.2%、7.6%。如果从更长的时间段观察，进入本世纪以来在加入世

贸组织的开放筑应和关联改革推动下，浙江 GDP 增速曾由 2001 年的 10.6% 上升到 2007 年的 14.7%，年均增速 13.4%。而 2008 年是个转折点，这一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市场出现逆性变化。受此影响，2009 年一季度浙江经济增长仅 3.4%。虽然 2008-2010 年间 GDP 季度增长率走出了 V 字形大幅反弹轨迹，但从 2010 年二季度以来浙江 GDP 增速总体上呈现回调态势，无论是季度 GDP 增速还是年度 GDP 增速都在波动中出现了大幅回落。季度增速从 2010 年一季度的 15.0% 回落到 2014 年一季度的 7.0%，增速下降一半多；年度增速由 2010 年的 11.9% 回落到 2014 年的 7.6%，下降 4.3 个百分点；2011 年—2014 年均 GDP 增速 (8.2%) 比 2001—2007 年均增速下降了 5.2 个百分点 (见图 1)。从全国范围来看，浙江近年经济增速的回落虽不是独有现象，但回落幅度却大于江苏、山东等省，明显下了一个台阶。



浙江经济增长回落的背后，是影响经济增长中的供给和需求因素发生了趋势性逆转，支撑传统模式的增长动力尽显疲态 (见图 2)：从工业看，2008 年之前浙江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保持在 15%—20% 左右，工业经济走势基本决定经济发展态势，而近两年增速已下滑到个位数增长，工业经济减速成为当下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从出口看，出口增速从过去 20 写以上大幅回落至近两年的 10% 左右 (2012 年出口增长仅 3.8%)，在个别月份甚至出现负增长，这样的一种调整不仅是因为外需的变化，更主要的是传统出口竞争优势不断减弱 (2014 年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仅增长 5.2%)；从投资看，尽管近年增速扭转了此前 (2005-201 年) 连续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局面，但伴随着投资边际产出不断递减 (“十二五”以来全省投资效果系数下降到 0.2 左右)，企业自主投资意愿下降，2012 年后投资增速也开始相对放缓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分别为 21.4%、18.1%、16.6%)。



更深入地看，浙江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并不是一种短期波动，而是一种趋势性的表现，体现了浙江经济阶段性变化的基本特征。国际经验表明，一批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台湾等二

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在人均 GDP 达到 11000 国际元时，几乎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平均降幅达 30%-40%。若按照浙江过去 30 多年约 13.0% 的平均增速回落 30%-40% 算，浙江经济增速在 7.8%-9.1% 之间是一个合理的区间，2011 年—2014 年浙江经济增长也基本上落在这一自然区间。事实上，随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口红利因素淡出、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浙江已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现实经济增长率随之下降比较正常。从另一方面看，自 2012 年起浙江经济增速波动逐渐趋稳，降幅明显收窄，表明经济增速换挡态势已基本确立，中高速增长区间逐渐清晰。我们认为，今后三到五年经济运行区间稳定在 6%-8% 之间、年均增速保持 7.0% 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将成为浙江经济的一个新常态，再往后可能是更低的中速增长或中低速增长。

浙江经济走到今天，已不能只看速度，更重要的是提升质量和效益。新常态下的浙江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则必须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2014 年初，省政府就鲜明地提出“两个主动”——“主动把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主动把重点聚焦到提质增效上”，表现为对质量、效益、创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过去一年，尽管速度放缓了，但资源要素利用效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创业创新机会增加了，无论是从企业收入、财政收入还是从城乡居民收入来看，浙江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都保持了较高水平（见表 1）。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比任何时候都更显重要。我们要从昔日的 GDP 崇拜和速度型情结中挣脱出来，以平常心对待一个并不太快但扎实有效的中高速增长，力求使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成为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

表 1 2014 年浙江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主要指标

	2013	2014	增速(%)
地区生产总值(GDP)(亿元)	37756.6	40153.5	7.6
人均 GDP(元)	68805	72967	7.3
R&D 经费支出(亿元)	826.5	940	15.0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10.2	17.3	9.1
利润总额(亿元)	3385.9	3543.7	5.1
财政总收入(亿元)	6908.4	7521.7	8.9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7080	40393	8.9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7494	19373	10.7
万元 GDP 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0.63	0.592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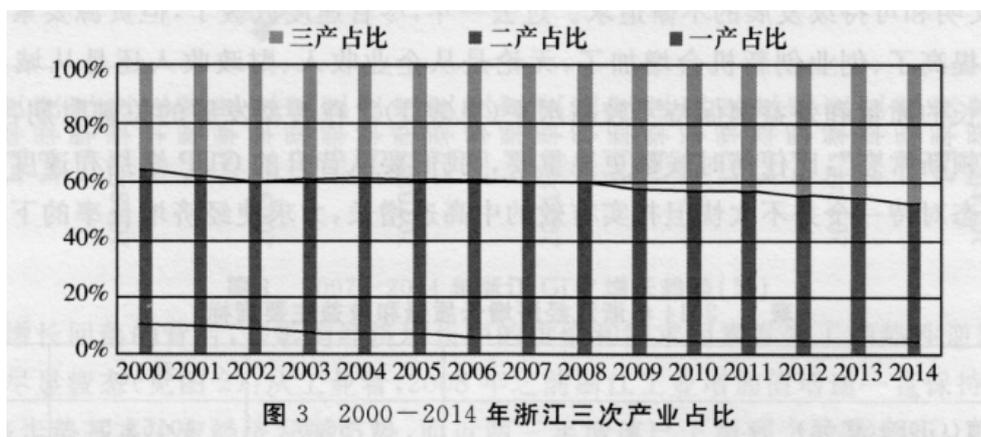
三、结构转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

“跳出速度看结构”，经济发展新常态并不是增速的简单换挡，而是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集中表现。历史和现实数据对比表明：浙江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具有中长期意义的转折性变化，“结构优化更趋明显”，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动力结构、城乡区域结构、治理结构等显现出加速调整升级迹象，正在稳步走向经济“新常态”。

（一）产业结构：第三产业比重超第二产业，从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态势更趋明显，产业向中高端升级趋势开始全面显现

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双重任务。2014 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幅比 GDP 和第二产业高出 1.1 个、1.6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 52.1%；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上年的 4.7：47.8：47.5 调整为 4.4：47.7：47.9。无论从工业化进程看，

还是从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看，2014年服务业比例首次超越工业比例，都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转折点。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工业始终是浙江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而在经历多年的迅速扩张后“浙江制造”高速增长时代已很难再现，工业相对比重下降的长期趋势开始形成，而服务业却保持连续多年增长领先、比重提升态势，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趋势性超过第二产业，表明浙江已经开始进入主要以服务业快速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轨道，而凡是成功迈向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都经历了一个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过程。同时，三产业内部结构也逐步趋于优化，受益于互联网络的发展，电子商务、物流快递、互联网金融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快速成长（其中，2014年全省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2万亿元，增长25%）。浙江服务经济时代正在悄然来临。



从工业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看，制造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转型升级组合拳效应日益显现。表现为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和占比都在提升，同时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加速成长，向中高端迈进的态势非常明显（见表2）。另一方面，传统产业中产能过剩行业和高耗能行业持续调整，2014年八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仅增长4.6%，增幅比规模以上工业低2.3个百分点。而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特别是机器人、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大数据应用日益成为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技术手段，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趋势愈发明显。从某种意义上看，用新一轮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创建产业新优势将是浙江最大的机会，正在推动产业从低端迈向中高端，重塑浙江产业竞争新优势，形成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多点支撑”。

	增加值(亿元)	同比增长(%)	占比(%)
工业	12543	6.9	100
高新技术产业	4283	8.5	34.1
装备制造业	4328	8.9	34.5
战略性新兴产业	3075	8.6	24.5
高端装备制造业	296	7.1	2.4
电子信息制造业	1134	8.2	9.0

（二）需求结构：内需增长贡献继续改善，投资主驱动转变为投资—消费双驱动，消费升级、投资提质的需求变动态势正在形成

旧常态下需求结构的典型表现就是投资和出口增长强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动力，而消费不振则是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深层矛盾和结构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明显减弱，外贸出口增长放缓，经济增长增量的贡献主要是投资与消费两大内需，而相对于投资和出口增长的较大波动性，消费需求处于平稳上行的通道，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趋于上升，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显著。而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在近年各级政府严控支出“零增长”的背景下（2014年全省“三公”经费支出下降34.4%），居民消费贡献了全年最终消费增量的主要部分。实际上，目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并不是全口径的零售消费，我们不必拘泥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这一指标，更应关注消费结构调整升级变化、消费内生动力支撑以及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地位的转折性变化。浙江较早地把握消费需求结构升级的大趋势，主动应对需求新变化，信息消费、绿色消费、品牌消费、健康消费、文化消费、旅游消费等新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高品质消费主导的新需求结构正在形成。而随着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兴起，便利的购物方式和价格优势，网购消费更成新潮流（2014年全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高达47.6%），线上线下互动成为新趋势。

消费主导并非不要投资，经济结构的增量调整要靠投资实现。虽然传统投资空间有限，投资增速重新下移（2014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6%，增速较上年回落1.5个百分点），但由于更加强调定向、精准的有效投资，新一轮投资结构调整呈现优化态势，表现为民间投资增速快于同期整体投资和国有投资增速、服务业投资增速和占比在三次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工业技改投资增速快于工业投资。在目前的投资格局中，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三分天下”，但与过去多年不同，房地产不再是投资这架马车的重要选项（2010-2014年，浙江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增长34.4%、48.5%、16.8%、18.9%、16.8%，增速下降趋势十分明显），全社会投资更注重结构调整和民生保障，投资重点正在转向重大产业项目、工业技术改造、信息基础设施、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铁路、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转向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投资。引人注目的是，智能制造、智慧物流、高端装备、工业机器人等正在成为投资新热点。

（三）动力结构：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向创新驱动的新增长方式转换趋势正在形成

动力转换决定着增速换挡和结构优化的进程与质量。近年受益于鼓励创新政策的实施，驱动浙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新机制、新模式开始崭露头角，表现为科技投入大幅增长、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大量出现、原始创新初露端倪，企业创新活力不断增强。2014年，全省全社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1470亿元，比上年增长13.7%，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3.66%；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34%，比上年提高0.16个百分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比上年增长21.6%，高于工业总产值增幅15.2个百分点；新产品产值率为29.2%，比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以创新、技术、信息为内涵的新增长点替代过去的经济增长点，从要素驱动的传统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的新增长动力转换态势正在形成，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更多的由以创新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新阶段。

尤其是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快速深化，技术、产业和模式的跨界融合渐成主流，产业形态、市场业态、生产方式的变化更迭明显加快。浙江在互联网产业领域已经成长起来一批站在前沿的创新型企业，以阿里巴巴为龙头的电子商务平台、第三方支付、互联网金融、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处于领先地位，浙江已站在了新一轮信息技术变革和新兴业态发展的高地。在“互联网+”时代，拥有互联网产业先发比较优势的浙江经济，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升级换代，大数据应用的产业创新和网络服务正在成为主导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可以说，顺应“互联网+”正在孕育的竞争新常态，信息经济的“七中心一示范区”建设正在带动浙江产品服务、商业模式与管理机制的创新，重构全新的资源配置模式、产业生态体系，引领全国新一轮互联网创业浪潮（如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创客”正在迅速成长），并推动产业组织形式向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转变。而像梦想小镇等载体平台、“众创空间”更是形成了互联网创业创新的生态圈，进一步集聚了风投、基金和创业人才，开始批量产生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浙江正在成为一个充满创新机会的中心。

（四）城乡区域结构：城市化率稳步提高，城乡区域差距逐渐缩小，以一体化为目标的城乡和区域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新常态下推进结构调整、有效扩大内需的重要战略支点。浙江是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的省份，随着“四化同步”进入转型与协调并重的新阶段，抢抓新型城镇化和小城市培育试点重大机遇，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统筹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城市化进程加快带动了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创业创新机会的大幅度增加，进而带动城乡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2014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7%，超过经济增长速度2.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8.9%、10.7%，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继续超过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上年的2.12倍缩小至2.09倍左右。收入分配上的两个“超过”是多年结构调整的重大成果，而突出以城乡联动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呈现出良性循环的态势，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被破除，城乡关系正在重塑。

同时，区域增长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区域均衡发展水平日益提高。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初显雏形（经济总量约占全省的60%），嘉兴、湖州、绍兴、衢州、舟山、台州、丽水7个省域中心城市集聚能力不断增强，城市经济在全省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而以产城融合为着力点，特色小镇建设正在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方向，成为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富民，把生态优势化为经济优势，近年来26个欠发达县（市）年均经济增长比全省同期快1个多百分点，资本积累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等指标差距逐渐缩小，26个欠发达县已正式“摘帽”，浙江已成为全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五）治理结构：简政放权的力度和速度前所未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在深化改革中大幅调整，市场机制与市场主体作用日益增强

历史地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每一轮增长的背后，都有先行改革的强力支撑。如今浙江把握增长、转型和改革高度融合的特点，“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一种关乎现在、更关乎长远的‘深刺激’”，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有利于激发民间与市场活力的制度安排，新治理结构体系正在形成，政府和市场两者的结合已达到一个新的状态，有效的制度供给正在缔造“新浙江活力”。特别是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省级部门权力事项由1.23万项缩至4236项，精简幅度超六成；省级实际执行的行政许可事项从1266项减少到322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面取消。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的红利正在持续释放，大众创业氛围越来越浓厚。2014年，全省新设企业23.6万户，比上年增长10.3%，新设个体工商户52.3万户，小微企业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浙江改革尊重基层首创，鼓励先行先试，改革试点大潮迭起。海宁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平湖市产业结构调整机制、德清县城乡体制、开化县和淳安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诸暨市扩大民间资本进入社会领域、台州市小微金融等改革创新试点……在全省范围形成了改革样本。从增长效率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有效地改进各类要素特别是土地、资源、资本等的配置效率。而像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已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进，形成了“亩产论英雄”的土地配置机制、“环境论英雄”的环境容量配置机制、“节能论英雄”的能源配置机制、“效率论英雄”的资金配置机制，对传统资源配置的运行模式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四、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面临的挑战和建议

浙江经济已经站在新常态的历史门槛上，经济结构和形态的趋势性变化反映了经济正在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和新的结构平衡。然而，转变还远不是一个“完成时”，而是一个艰难的“进行时”。进入“新常态”对浙江更多的意味着是挑战、是阵痛。能否应对挑战，不断化解和妥善处理、适应新旧均衡状态转换过程中“阵痛”或者“风险”，是经济能否顺利走向“新常态”的关键。

（一）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

1. 新旧增长动力转换的挑战

“新常态”的实质是新旧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一方面，原有的要素投入、外延扩张的效应已见边际，“五个过度依赖”（过度依赖低端产业、过度依赖资源要素消耗、过度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度依赖传统商业模式、过度依赖低小散企业）已难以为继，旧有结构在深度调整；另一方面，尽管结构优化调整取得重要进展，消费、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在增长中的地位加强，新的动力格局开始显现但新结构并没有完全形成，新产业、新增长点体量都还比较小，短期内难以弥补传统增长动力消退带来的影响。总体上，在动力机制转换过程中新旧动力还没有衔接到位，新动力全面取代传统动力占据经济增长主导地位还需要较长时间。

2. 产业转型升级的挑战

过去产业转型升级可以通过要素投入、依托技术模仿消化引进来实现，如今产业转型升级与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越来越融合为一体。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新态势，浙江创新能力薄弱、创新资源不足问题开始凸显，区域创新要素的供给与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难以支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致很难突破“低端制造+低端服务”的价值链“低端锁定”。在新常态下构建产业竞争新优势，发展接续支柱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培育发展所经历的时间周期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长得多、难得多。特别是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是竞争高地，当新兴产业成长速度赶不上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产业被替代、淘汰的过程，浙江将有可能出现产业发展接续“空挡”风险。

3. 企业竞争优势再造的挑战

随着个性化、差异化的品质需求开始逐步替代“量大面广”的同质化需求并成为常态，质量型、差异化的竞争取代过去数量扩张与价格竞争，传统的要素投入增长已经不能再给企业带来收入与利润的增长，在新常态下企业竞争力将主要来自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创新活动。虽然这些年一批依靠创新形成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浙江企业正在逆势而上，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不断增强，但大量创新能力低弱的中小企业则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企业盈利能力明显下滑，持续竞争力越来越差，庞大的浙商群体面临活力减弱、转型艰难的严峻考验，一些企业甚至深陷债务风险“难以自拔”。从一定意义上说，浙江产业乃至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发展方式和盈利模式转换能否成功。

4. 政府管理应对的挑战

经济发展形态的改变意味着政府的行为方式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从国家层面看，从重权力到重责任、从重审批到重监管、从重管理到重服务、从重数量到重质量……政府主导型的调控方式正在退位，调控手段将由行政手段为主，向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手段和适当的行政手段相结合转化，为市场消除障碍、为企业松绑。这种变化要求各级政府在施政目标、利益机制、工作载体等多个方面都有所调整，在市场领域，政府要尽量退出来，充分放手让市场参与；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则要强化服务，把该做的事都做好，为市场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而破除以往思维定势、行为惯性和路径依赖，需要进一步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建立新的规范和行为准则，这对各级政府而言无疑是一个挑战。

与挑战应对密切相关的是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风险积聚。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新常态下的各种挑战，不能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原来的产业优势消失而新的产业发展优势不能形成、原来的企业竞争优势消失而新的竞争优势不能形成，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就会出现“青黄不接”，区域性的财政金融风险会累积增加。目前一些行业企业的赢利水平大幅下降，部分行业困难企业呈蔓延

扩大趋势，而房地产市场分化调整，房地产业去库存化任务依然较重，资产估值大幅回落，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削弱了一些地区和企业偿债与融资能力，这都反映了结构调整滞后、创新能力不足等结构性矛盾加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局部地区民间借贷和不良贷款率反弹以及地方融资平台偿债压力等问题开始暴露，化解各类风险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同一般经济增长时期相比，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由某个事件或问题引发局部风险乃至演化为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在提高，从而有可能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二）推动经济加快进入“增长中高速、质量中高端”轨道的两点建议

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将是浙江经济中高速增长企稳期、风险集中释放的化解期、增长动力更替的衔接期，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夯实地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重构新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源泉，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经济质量中高水平的“双目标”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核心所在。要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积极抢抓深化改革、“互联网+”、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重大机遇，突出制度供给与强化创新驱动，坚持以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稳发展适应速度变化，加快经济增长新动力、新优势的培育，努力走出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发展新路。

一是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机遇，加快形成更加高效的新制度供给。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基本途径。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态势已经形成，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突出制度供给”。要从浙江的实际出发，全面加大制度供给的战略部署，重点加强科技创新引领的相关制度供给、环境倒逼的相关制度供给、“四换三名”推动的相关制度供给、新型城市化撬动的相关制度供给、国家战略带动的相关制度供给。尤其要突出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力争在率先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取得新突破，打造“更有效率的政务生态系统”，以政府自身革命带动重要领域改革，从而以更完备的市场化改革，充分释放浙江市场经济的巨大活力，再创体制机制领先优势。

二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加快形成更加强劲的创新驱动增长新模式。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浙江实施全面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鲜明特点是“互联网+”，以及信息、生物、能源、材料等技术的交叉融合和推广应用；从国家层面看，“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众创空间”等一系列新概念已上升为顶层设计。浙江要破除传统路径依赖，以互联网思维打造“更有活力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推进包括产业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平台载体创新等全方位创新，推动浙江产业、企业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要围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着力在“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站在前沿的创新型行业龙头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要加快要素市场和平台体系建设，完善创新基础设施和孵化载体，形成一批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城市或区域。要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打造高端人才创业创新高地，从而为实现“增长中高速、质量中高端”奠定坚实的动力基础。

责任编辑：毛伟